

以“大本大源”动天下之心

——毛泽东关于党内生活思想的历史文化基础探析

刘一楠

(中共广州市委政策研究室干部、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访问学者)

【摘要】严格的党内生活，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优良传统和政治优势。作为中共的创始人之一和党的领袖，毛泽东青年时期受到以湖湘学派为代表的儒家内省修身传统和“师友夹持”的团体式道德践履影响，他在长期革命斗争的实践中，创造性地将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紧紧抓住思想建党、直指人心的“大本大源”，推动开展党内民主生活，倡导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优良作风，不断建立和完善党内生活的各项制度、根本方法和准则，极大地增强了党的凝聚力、战斗力，并最终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次历史飞跃的重要组成部分。

【关键词】毛泽东思想；湖湘学派；党内生活；批评与自我批评

【中图分类号】D610.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462(2015)02-0069-06

DOI:10.13977/j.cnki.lnxk.2015.02.013

1917年8月，年仅24岁的毛泽东在给老师黎锦熙的信中，写下了这样一段话：“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观其收拾洪杨一役，完满无缺。使以今人易其位，其能有如彼之完满乎？天下亦大矣，社会之组织极复杂，而又有数千年之历史，民智污塞，开通为难。欲动天下者，当动天下之心，而不徒在显现之迹。动其心者，当具有大本大源”^{[1]84}。在青年毛泽东看来，要担负起历史上空前的改造中国之重任，必须要有“大本大源”，其基础在于“倡学”，关键要落实到“动人心”，才能“动天下”。在早期革命实践的过程中，如何通过“动人心”以凝聚革命理想、增强革命队伍力量，是毛泽东思考的核心问题之一。一方面，就个体而言，要有“大本大源”的精神内核和共产主义的革命理想，以党性修养和道德磨砺成就“心体”；另一方面，组织是无产阶级斗争的唯一武器，必须通过建立严格科学的党内生活，铸造一个有着高度凝聚力、战斗力的无产阶级政党组织。作为中共的创始人之一，毛泽东深受以湖湘学派为代表的儒家内省传统和“师友夹持”的团体式道德践履影响，创造性地将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建立和完善党内生活的各项制度、方法和准则，推动党内生活民主化、科学化和制度化，为增强党的凝聚力、战斗力奠定了思想基础。本文将考察毛泽东关于党内生活思想的精神渊源和历史演进的脉络，试图展示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次历史飞跃的一个历史侧面。

一、“日课”与儒家内省传统：“自我批评”精神的熏染

青年毛泽东在1913年进入湖南师范学校后，广泛阅读王船山、曾国藩、胡林翼等湖湘学派代表人物的著作，尤其是杨昌济等师长的言传身教，让青年毛泽东深受以湖湘学风为代表的儒家“内圣外王”的精神浸染。其中影响最深的，莫过于立日记以求内省的儒家修身传统和“师友夹持”的团体式道德实践这两个方面。“立日记”的传统可以追溯到宋代，当时就已作为书院的一

种教学传统，而到了明代中后期，受到袁黄“功过格”的影响^[2]，这一行为逐渐转化带有簿记性质的修身册子“日谱”，通过在日间所思所行，功过并录，无所遗漏的记录下来，以供自我反省和改进。清代儒者颜元将之称为“日日工程”，认为只要一日没有“工程”，便会像高飞在天的鸢鸟突然收掉翅膀一样，会即刻掉落在地上^[3]¹³¹。因此，日记作为一个儒者生命的纵深过程的完整记录，已经成为道德功夫在内心不断转化和提升的一种“修身凭证”。

这一形式则在晚清中兴名臣、湖湘学派的核心人物曾国藩身上得到了强毅的传承，在曾氏问学唐鉴之初，唐鉴便向他称赞倭仁“用功最笃实，每日自朝至寝，一言一动，坐作饮食，皆有礼记。或心有私欲不克，外有不及检者，皆记出”^[4]⁹²。在唐鉴、倭仁的引导下，曾国藩立下的日课十二条，多是以内省为出发点的儒学日常修身工夫。在曾国藩的日记和家书中，其通过内省记录和检讨自己的不足随处可见，痛骂自身缺点毫不留情，直指灵魂深处。曾国藩的日记在后世流传极广、影响极大，作为湘籍著名的教育家，杨昌济的治学立身行事，处处以曾国藩为楷模，从其《达化斋日记》中可见，他坚持抄写曾国藩的日记和家书，亦借此以自省，如“今日从周印昆处借来曾文正手书日记，共四十本。……观文正之所以自克者，如多言、好名、忿怒等，余幸无之；又如好谐谑，亦非余之习惯。”^[5]²杨昌济对曾国藩的尊崇也深刻影响了青年毛泽东，他认为毛泽东资质俊秀、人才难得，“以农家多出异材，引曾涤生、梁任公之例以勉之。”^[6]¹⁸在毛泽东当时的笔记本《讲堂录》中，就多处抄录了《曾文正公日记》、《郭嵩焘日记》和杨昌济《达化斋日记》，如“涤生日记，言士要转移世风，当重两义：曰厚曰实。厚者勿忌人；实则不说大话，不好虚名，不行架空之事，不谈过高之理。”^[1]⁵⁸¹作为一个“师范生”的青年毛泽东，在师长的影响下，也养成了“立日记”的习惯。毛泽东当时过从甚密的老师之一黎锦熙，就是从13岁开始记日记直至89岁临终，从未间断。我们可以黎锦熙的日记中得到青年毛泽东记日记一些旁证：“十一月二十三日，晚饭后，作柬复毛润之，凡四笺。戒其躁急偏隘；以渐与恒及宁静致远勉之，首纠正其所论君臣原理，谓宜从国家学政治学中研究，出校求学，当有相当之所云云”^[7]。可见，毛泽东在青年时代就深受相互批阅日记、藉此以正德修身的儒学传统影响。在1915年8月写给萧子升的信中，毛泽东说自己“读曾公之书”，也尝试通过记日记方式，进行自省剖析，并题为“自讼”，指出自己“无静谥之容，有浮嚣之气”，身上有“姝姝自悦，曾不知耻”的自以为是之气，如此下去，将难以求实^[1]¹⁹。从这一篇文笔奇诡、自问自答式的短札中，可见传统儒学中自我批评的精神种子，已经在青年毛泽东的思想中生根发芽。

二、讲学与“师友夹持”的团体式道德践履：新民学会民主生活的初步探索

晚清湖南士人欧阳兆熊在《水窗春吃》书中，留下了一条关于曾国藩之学“一生三变”的笔记：“文正一生凡三变。……其学问初为翰林词赋，既与唐镜海太常游，究心儒先语录，后又为六书之学，博览乾嘉训诂诸书，而不以宋人注经为然。在京官时，以程朱为依归，至出而办理团练军务，又变而为申韩”^[8]¹⁷。其实所谓“一生三变”，曾氏成学最关键的实是在第一阶段，即研习宋明理学获得儒家精神人格的“关键跳跃”，这是曾氏为学之本，即“以程朱为依归”，“申韩”不过是其学之用。助成曾国藩早年实现这一思想再造的，是当时一个以唐鉴、倭仁等人为核心的京城士大夫理学团体。与这一团体的往来交游，让曾国藩能够“日就而考德问业”，“且为义理所薰蒸”，是促成其从翰林词臣向理学圣哲转变的重大机缘，使得曾国藩能够从世俗的功名仕宦中人精神独立出来。这一成学过程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所谓“师友夹持”：即理学团体中，士大夫彼此监督、互相切磋，从而受到共同进德之效^[9]³⁰⁶。这一理学团体的修身方式，无疑可以看做是宋明以来儒者讲学传统的延续。

儒家经典《礼记·学记》就提出“独学而无友，则孤陋而寡闻”，团体式的切磋进学方式，成为儒家思想传播的一个重要特点。儒者之间以此进德修业，相互切磋互证所学、直言过错，既

包括学友间相互激励，更是彼此通过在群体讲学生活中相互坦呈自省，即所谓“师友夹持”，以有助于改过迁善、修身进德。而到了晚清，曾国藩所参与的京城士大夫理学团体，也继承了这样的修身方式。这种团体式的道德践履，至洪杨军兴、湘军集团崛起的风云际会中，更发挥到极致，深刻地影响了一代风气。此后，曾国藩以疆臣开府，幕府宾僚更极一时之盛，与其说这是一种湘军集团领袖创设的体制，不如说这是湖湘学派道德修身团体的一种扩大形式，而且更多了一层经世救民的实践努力。

数十年后，这种儒家士大夫讲学论道的士风，也潜移默化地影响了一大批湖湘革命青年。1918年4月，毛泽东和蔡和森、萧子升等一批志同道合的湖南青年，发起成立了新民学会。学会之名取义于《礼记·大学》“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学会以“革新学术，砥厉品行，改良人心风俗”为宗旨。蔡和森曾在给毛泽东、萧子升的信中写道：“三年而来，每觉胡林翼之所以不及曾涤生者，只缘胡夙不讲学，士不归心，影响只能及于一时……”^{[10]50}。前引毛泽东致黎锦熙信亦称：“愚意所谓本源者，倡学而已矣，惟学如基础，今人无学，故基础不厚，时惧倾圮”^{[1]84}。由此可见，由湘籍革命青年发起新民学会，志在“改造中国与世界”的同时，也自觉延续了以曾国藩为代表近世湖湘儒风的精神命脉。新民学会的早期发起成员大都受杨昌济“奋斗的和向上的人生观”影响，“如何使个人及全人类的生活向上”成为这一青年团体热切讨论的核心问题。据《新民学会会务报告》记载，相与讨论这类问题的人，大概有十五人，讨论的密度频繁，大概有上百次，由此产生了“集合同志，创造新环境，为共同的活动”的团体诉求，^{[6]40}这即是发起建立新民学会的精神动因。

由毛泽东主笔起草的《新民学会章程》，在提出学会宗旨之外，订立了学会的五条“规律”即“规约”：“不虚伪，不懒惰，不浪费，不赌博，不狎妓”^[11]。可见学会团体生活最初的重点，是偏重于通过相互学习探讨，改造旧社会的不良习性，养成新的个体德性，强调的是个人身心的修养工夫。毛泽东在给萧子升的信中也指出，“吾人立言，当以身心之修养，学问之研求为主”^{[1]599}，亦暗合“涤旧而生新”之意，这与曾国藩早年所参与的理学讲学团体的道德实践方式无疑是切近的。

新民学会会友通过研讨会和通信等方式，自由地发表自己的见解，在团体生活中进行内省与相互批评，学会的第1号会务报告就客观地分析了优缺点，指出缺点在有些会友遇事较轻率，做事也多于求学，思想难免有幼稚处等，并于后来的常会上，特地将“个性之介绍及批评”列为会议讨论内容。^[10]特别是1921年1月毛泽东致彭璜的一封信，其中批评与自我批评内容之坦率，态度之真诚，可窥当时新民学会团体生活的民主风气之盛。彭璜是当时湖南学生联合会的会长，此信缘起于彭璜和易礼容之争，两人均是青年毛泽东的同志和挚友，兹不避文繁，特转引如下。信中毛泽东首先剖析自己的缺点：“弟两年半以来，几尽将修养工夫破坏：论理执极端，论人喜苛评，而深刻的自省工夫几乎全废。今欲悔而返乎两年半以前，有此志，病未能也。”^{[12]18}随即在赞扬彭璜的优点之后，转而不留情面地指出了彭璜身上的十条缺点：“一、言语欠爽快，态度欠明决，谦恭过多而真面过少。二、感情及意气用事而理智无权。三、时起猜疑，又不愿明释。四、观察批判，一以主观的而少客观的。五、略有不服善之处。六、略有虚荣心。七、略有骄气。八、少自省，明于责人而暗于责己。九、少条理而多大言。十、自视过高，看事过易。”^{[12]18}之后，毛泽东又再次主动自我剖析，谦虚指出自己的观察也不一定得当，认为除言语不够爽快、容易猜疑和不服善治三条之外，其缺点自己身上也一概都有，并特别指出自己意志还不够坚强的缺点，自戳痛处，毫不遮掩。最后，毛泽东对团体生活内的争论进行了初步总结，提出不搞无原则的纷争，认为“惟有主义之争，而无私人之争”。这封信中展现出来是青年毛泽东正所谓以“师友夹持”方式，引导新民学会成员之间进行态度诚恳、言之恳切的相互批评，助同志改过提升。这也可看作是毛泽东后来的形成“团结一批评一团结”方法的初步尝试。

书信是新民学会成员思想交流的重要方式,根据学会规定,会员每年要给干事会写一封信,后来由毛泽东把这些信汇编成了三集《新民学会会员通信集》,共收书信47封。这些书信,即有益于学术讨论问题和研究,也有益于会务进行,并且都能“引起会员团体生活的兴味”^{[1]578}。此后,作为无产阶级革命家和党的领袖的毛泽东,多次在重要历史时刻以书信的方式向全党传达自己的思想,也可以在新民学会时期找到这种思想交流方式的渊源。除了书信交流制度,毛泽东还主持制定了新民学会中组织生活的多项制度,比如,凡在长沙工作和读书的成员,每隔半月或一月,须召开一次会议。每次会议都围绕一个中心内容,包括学习讨论、讲座或发展新会员等。此外,每年还要召开年会,并由毛泽东负责整理编排形成《新民学会会务报告》,印发给会员学习。蔡和森等新民学会核心成员留法勤工俭学后,继续通过与毛泽东等国内成员通信的方式,旗帜鲜明地提出中国要走俄国十月革命的道路,阐发了要创建共产党的设想。^[13]毛泽东给蔡和森的回信称赞他“见地极当,我没有一个字不赞成”^{[14]4}。而学会“改造中国与世界”宗旨的政治实践逻辑,必然要求与推动社会革命的“主义”相结合,正如1920年11月毛泽东对学会建设提出的新建议,指出学会“不可徒然做人的聚集,感情的结合,要变为主义的结合才好”^{[10]97},要把“主义”的旗子立起来,才能指引大家前进。这也意味着,新民学会由一个初期在湖湘土风影响下的成立的强调个人修养锤炼、偏重学术研讨性质的青年团体,最终成长为以马克思主义旗帜的无产阶级革命政党组织的雏形,也为日后的开展党内生活进行了初步探索实践。

三、从古田会议到延安整风:在革命斗争实践中推动党内生活的科学化制度化

列宁指出,“无产阶级在争取政权的斗争中,除了组织,没有别的武器”^{[15]158}。中共在建党之初就十分重视党的组织建设,二大、三大、四大党章都详细规定党小组和支部等党内生活载体的会议制度。但随着革命斗争的形势发展和队伍的不断壮大,特别是大革命失败后,毛泽东领导队伍开辟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大量农民加入了党的队伍,党的思想教育不力、党内组织生活制度不健全等问题逐渐暴露了出来,对执行正确的路线方针造成了极大威胁。在这一大背景下,1929年12月,红四军第九次党代会即古田会议通过了毛泽东起草的决议案,开宗明义地提出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认为“红军的党组织问题到了非常严重的时期”,必须努力进行改造以确保担负起政治任务,对于极端民主化思想、非组织的观点、主观主义、个人主义等错误观点都进行了详细的批评,并提出了纠正的方法。第一,规定了在组织上,要实行“厉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生活”。强调少数服从多数是党的纪律之一,并首次指出党内批评是坚强党的组织、增加党的战斗力的武器。同时,对党委或同志的批评应该在党的会议上提出,并要防止主观武断和把批评庸俗化。^{[14]81-84}第二,规定了“新分子入党”的5项条件。即:1. 政治观念包括阶级觉悟没有错误;2. 忠实;3. 有牺牲精神,能积极工作;4. 没有发洋财的观念;5. 不吃鸦片、不赌博。^{[14]90}第三,对如何进行党内生活提出了具体要求和指导。提出各级党组织应该有计划地每月规定支部大会及小组会讨论的材料和会期,严密地督促开会。支部会议的目的主要是解决问题和教育同志。强调一切斗争的问题、内部的问题,都要在会议集中讨论解决。毛泽东还特别批评了那种“死板无活气,到会如坐狱”的封建式会场秩序,指出要采用很好的技术把会开好,反映“无产阶级之积极活泼的爽快的精神”^{[14]91-92}。应该说,古田会议决议提出的一系列关于党内生活的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新民学会章程中找到渊源,比如,关于发展新党员的5项条件,与新民学会章程吸纳会员的5条规约相比,更加突出了党员必须以政治思想觉悟作为首要要求;与新民学会注重研讨学术不同,突出强调了党组织生活的政治化和实际化等。这也说明了经过近十年的革命斗争实践后,毛泽东在早期组织团体生活的朴素经验基础上,深刻把握并实践列宁提出一系列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包括“在党组织中真正实现民主集中制原则”、“应当对党内的问题广泛地展开自由的讨论、对党内生活中各种现象展开自由的、同志式的批评和评论”^{[15]346-347}等等,极大地深化了对马克思主义政

党内团体生活的重要性、规律性的认识，并在古田会议决议案中第一次进行了系统梳理总结。

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后，毛泽东开始着手系统思考和总结党的历史经验。在延安时期，针对“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毛泽东在多个场合突出强调了党内生活的民主化，在健全完善党内民主生活的规范和制度原则进行探索。1938年10月，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报告中指出，领导机关、党员、干部积极性的发挥，“有赖于党内生活的民主化。党内缺乏民主生活，发挥积极性的目的就不能达到。大批能干人材的创造，也只有在民主生活中才有可能”^{[16]529}。1941年起，整风运动在延安拉开了序幕，也正是通过整风，毛泽东创造性地提出了关于党内生活的系统思想，完成了将湖湘学派道德实践的传统与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紧密结合，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次历史飞跃的重要组成部分，发展出了一整套科学处理党内矛盾、增进党内团结的科学方法和优良传统，为增强党的生机活力提供了思想指引和有效途径。

第一，确立了“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宗旨方针。“惩前毖后”语出《诗经·周颂·小毖》“予其惩，而毖后患！”其意为要谨慎行事，以避免后患。毛泽东在早年给萧子升的信中就引用过这一成语，“若曰对人哓哓，退惟多失，惩前毖后，其慎言哉！然吾谓子升，不先有言，何以知失？知失则得，非言之功乎？若诚惩而毖之，子升其难知失也已”^{[11]13}。开展整风运动后，毛泽东再次提出“惩前毖后”，其基本含义是“对以前的错误一定要揭发，不讲情面，要以科学的态度来分析批判过去的坏东西，以便使后来的工作慎重些，做得好些”。而“治病救人”之说，宋明理学家强调修养工夫也多以“除病”为喻，如曾国藩自谓，“平生之病源，……其要在不诚而已矣”，“凡人皆有切身之病，刚恶、柔恶，各有所偏，溺焉既深，动辄发见，须自己体察所溺之病，终身在此处克治”，而“主敬则百病可除”^{[4]129-130}。毛泽东由此引申出，揭发错误、批判缺点的目的，“好像医生治病一样，完全是为了救人，而不是为了把人整死”^{[17]827-828}，对待思想上的毛病和政治上的毛病，采用“治病救人”的态度，才是正确有效的方法，这是团结全党所必须要坚持的方针，目的是既要弄清思想，又团结了同志。

第二，确立解决党内矛盾和整顿党风的根本方法——批评与自我批评。毛泽东早在1937年写《矛盾论》时就提出，党内矛盾要“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解决”。在整风运动中，他多次强调批评与自我批评方法的重要性，认为是“整风”这一个伟大的马列主义政党的思想斗争“不可缺少的武器”，是“马列主义方法论中最革命的最有生气的组成部分”^{[18]434}。这一马克思主义方法又可分为三个层次：一是“批评和自我批评是一个整体，缺一不可”。毛泽东把批评和自我批评的经验上升到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方法论进行了阐释，指出“分析就要批评，批评自己也要批评别人”^{[17]254}，并强调就领导者而言，对自己的批评是主要的，重心在自己。这是两点论与重点论统一的辩证法。二是批评又分为“正确的批评”和“不正确的批评”两种。正确的批评使党更加团结，不正确的批评如主观主义的批评，则会造成无原则的纠纷，会让党分裂^{[19]75}。三是批评应该是“严正的、尖锐的”，但又应该是“诚恳的、坦白的、与人为善的”。这是对于批评态度的要求，也与儒家思想所推崇的重要信条——“正心诚意”相一致。儒家经典《中庸》曰：“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诚不仅是天地万物的自然规律，更是个体应物处世、修养身心的最高境界。特别是宋明理学兴起以后，理学家无不以诚为依归，认为“性与天道合一存乎诚”，而曾国藩无论在修身还是事功上，更是皆不忘“以积诚而致之”，认为“故诚者，不欺者也。不欺者，心无私著也”^{[4]129}。又说“凡人以伪来，我以诚往，久之则伪者亦共趋于诚矣”^{[20]375}。毛泽东早在对于新民学会吸纳新会友的要求，就提出了“纯洁、诚恳、向上”三个条件^{[1]559}。他1945年2月在中央党校作报告时指出，“对同志、对战士、对人民，要讲老实话，是则是，非则非”，要采取“学习的态度、谦虚的态度”，“工作搞熟了，别人了解你了，然后再讲有什么缺点，人家就能听进去了，人家就会赞成，也会改的”^{[19]259}。在1945年中共七大的政治报告中，毛泽东第一次明确将批评和自我批评视为党的三大优良作风之一，也是中共和其他政党互相区别的显著的标志

之一。^{[17]1096}七大将批评与自我批评正式写入了党章的总纲：“中国共产党应该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经常检讨自己工作中的错误与缺点，来教育自己的党员和干部，并及时纠正自己的错误。中国共产党反对那种自高自大、害怕承认自己错误、害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情绪”，并提出，“在党的会议上批评党的任何工作人员”是党员的基本权利^[21]。

第三，明确党内生活民主化的最终目的是团结全党——具体化为“团结—批评—团结”的辩证法公式。毛泽东后来强调，“如果在主观上没有团结的愿望，一斗势必把事情斗乱，不可收拾，那还不是残酷斗争、无情打击？那还有什么党的团结？”^{[22]210}因此，党内生活和整风要“从团结全党出发是第一，加以分析批评是第二，然后再来一个团结”，运用“团结—批评—团结”三个阶段演进的辩证法来开展整风和党内生活，就“不怕挑拨”，“以斗争求团结”，争取更大的胜利。

至此，回顾毛泽东有关党内生活的思想的历史演进过程，我们可以看到，作为中共创始人之一和党的领袖，毛泽东有关党内生活的许多思想渊源，特别是以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增强党内民主、团结同志的方法，都可以从以湖湘学派为代表的儒家内省传统和“师友夹持”的团体式道德践履中找到精神的印记。正如毛泽东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的报告中所指出的，“学习我们的历史遗产，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给以批判的总结，是我们学习的另一任务”^{[16]533}。毛泽东的伟大之处正是其在中国革命的历史实践中，创造性地将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与中国优秀历史遗产相结合，紧紧抓住思想建党、直指人心的“大本大源”，推动开展党内民主生活，倡导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优良作风，不断建立和完善党内生活的各项制度、根本方法和基本准则，极大增强了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并最终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次历史飞跃的重要组成部分。●

参考文献：

- [1] 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湖南省委编辑组. 毛泽东早期文稿 [M]. 长沙：湖南出版社，1990.
 - [2] [美] 包筠雅. 功过格：明清社会的道德秩序 [M]. 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
 - [3] 王汎森. 晚明清初思想十论 [M].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
 - [4] 曾国藩全集·日记 [M]. 长沙：岳麓书社，1987.
 - [5] 杨昌济文集 [M]. 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3.
 - [6] 中央文献研究室. 毛泽东传（第1卷） [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
 - [7] 黎泽渝. 1915～1920年黎锦熙日记中有关毛泽东的记录摘抄 [J]. 党的文献，1999，（3）.
 - [8] 欧阳兆熊. 水窗春呓 [M]. 北京：中华书局，1984.
 - [9] [美] 余英时. 现代儒学的回顾与展望 [M]. 北京：三联书店，2004.
 - [10] 新民学会资料 [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
 - [11] 范忠程. 新民学会的“宗旨”、“规约”研究 [J]. 史学月刊，2011，（7）.
 - [12] 中央文献研究室. 毛泽东书信选集 [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
 - [13] 刘华清. 新民学会与湘籍无产阶级革命家群体的形成 [J]. 湖南师范大学学报，2005，（11）.
 - [14] 中央文献研究室. 毛泽东文集（第1卷） [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 [15] 列宁专题文集——论无产阶级政党 [G].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16] 毛泽东选集（第2卷） [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 [17] 毛泽东选集（第3卷） [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 [18] 中央文献研究室. 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 [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
 - [19] 中央文献研究室. 毛泽东文集（第3卷） [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 [20] 曾国藩全集·家书 [M]. 长沙：岳麓书社，1987.
 - [21] 中国共产党党章（1945年6月11日中共七大通过） [DB/OL]. 新华网. http://news.xinhuanet.com/ziliao/2002-03/04/content_696452.htm.
 - [22] 中央文献研究室. 毛泽东文集（第7卷） [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 （责任编辑：温松）